



近世河南方志中书院文教传统的制度性变迁*

简 东

摘 要:晚清民初河南书院的改制,实为传统教育制度应对近世危机的结构性变迁。通过对40余部河南方志的系统梳理可见,近世河南书院经历了从被迫改制到主动调适的转变,这一进程既体现为新式学堂对传统书院制度的组织形式替代,更蕴含着传统文教资源、治学精神与新型学制间的互渗与重构。这充分表明,中国教育的近世转型并非简单的制度移植,而是在国家意志、地方实践与文化传统多元博弈中形成的特有路径。新式学堂的普及化整合与书院精神的隐性延续构成了近世文教转型的一体两面,为我们重新审视近世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传统与现代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河南方志;书院;学堂;文教;近世化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2-0052-09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兼具教育、学术与文化传播功能的特殊机构,自唐迄清,绵延千载,总数逾7000所,在塑造地方文教生态、维系儒学道统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书院与方志之间关系密切。一方面,书院师儒常参与方志编纂;另一方面,方志则系统记载书院的制度沿革与人文活动,是观察地方文教生态演变的重要文献。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亦是传统书院制度的起源地^①,清代曾设有书院282所^②,其发展经历了复苏、兴盛、衰微、改制、废除的复杂过程,与此相呼应,清代河南方志对书院的书写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清初政局未稳,文教前景不明,关于书院的记载比较疏略;清代中期科举兴盛,方志在笔墨间尽显书院繁荣;晚清以来,内忧外患加剧,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方志则聚焦于书院的艰难转型。这

一变迁不仅反映了传统教育体制在近世的危机,亦揭示出地方文教体系在时代变革中的调适。本文以清末民初河南方志为中心,通过梳理其中所载书院的改制历程,探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近世转型中的地方实践及其深层逻辑。

一、必然与猝然:书院改制的时代背景与地方实践

中国传统书院制度历经千年演进,至清代已形成一套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的文教体系。然而,晚清以降,面对西学东渐的冲击与王朝自身的危机,这套延续已久的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河南作为书院文化积淀深厚的区域,其变革历程集中体现了传统教育制度在近世转型中的困境与调适。

收稿日期:2025-06-24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世河南传统书院改制与变革文献的整理研究”(2025XWH025);河南省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课题“书院制与书院文化资源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整合与应用研究”(HZC2026KT031);郑州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传统书院教育中文献学方法的当代探究与教学运用”(2024ZZUJGXM025)。

作者简介:简东,男,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450001),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献学研究。

(一) 传统书院的积弊与国家政治导向

清代中期以降,传统书院的衰微已呈历史必然之势。其积弊日深,主要表现为管理废弛、用人腐败、师德沦丧、教学空疏、学风僵化等,日益沦为科举附庸,背离了讲学明道、培育实才的初衷。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廷发布上谕:“各省教官废弛教职,懒于月课,书院义学,夤缘推荐,滥膺讲席,并有索取束脩,身不到馆者,殊失慎选师资之议,著该督抚学政等,务延经明行修之士,讲习讨论。如有学品庸陋之人、滥竽充数者,立即斥退,以励师儒而端教术。”^{[1]1050}此后,清廷屡发谕旨,力图整顿书院以振兴文教。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修补之举收效甚微,未能扭转其整体衰微的趋势,这是整个传统教育体系在时代剧变面前陷入困境的缩影。

道光二年(1822年),道光帝发布谕旨,指出当时书院负责人及其管理上存在的“废弛、冒滥、兼充”等一系列具体问题^③。12年后,道光帝在对给事中黄爵滋奏折的批示中也提到当时书院人事与管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1]1051}。咸丰帝一上台便下旨要求地方官员“于书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令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将“性理诸书”作为“导民正轨”^{[2]445}。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但沉重打击了清王朝,清廷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以自救。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国家急需人才,统治者将重建、恢复书院作为大力振兴文教的一项重要政策颁行,并针对教育的弊病制定改革举措。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晚清书院奇迹般地出现“大发展”。据邓洪波统计,同治年间年平均创建和修复书院数目甚至超过乾隆年间而位居清代第一,光绪年间的这一数目则位居第三^{[2]447}。也正是在同、光年间,西学内容进入书院的课堂,一些地方出现教会书院,但此类书院在当时的中州地区罕有。

甲午战后,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朝野改革呼声高涨,书院改制被提上日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在《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里明确申述了各地书院的积弊,提出靠八股文已很难培育人才,应改书院为学堂,建议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3]。但清廷始终未能拿出一个真正行之有

效的全国性改制方案,只是将其主张发给各省督抚学政,让各地“参酌采取,以扩旧规而收实效”^[4]。在戊戌变法期间,书院改制也被作为变法的重要议题,康有为提出“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5]。但清廷诏令骤下又旋复,政策剧烈摇摆。最终,在庚子国变后“新政”的驱动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式颁行《改书院为学堂上谕》,要求各省府州县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并强调“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用”^[6],要求“督抚学政切实通筹,认真举办。所有慎延师长,妥定教规,及学生卒業,应如何选举鼓励,一切详细章程,著政务处咨行各省,悉心酌议”^[6]。此谕虽意图兼采新旧,但其改革书院的举措仍然围绕着所谓的“实学”,教育思想比较单一、陈旧,更没有一个富有全局性、长远性的具体改制方案,反而是将“妥定教规”等职责推给各地督抚,为地方仓促响应、急于求成埋下隐患。后来,“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行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更使书院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制度基础,也使这场本已急促的转型变得更为仓促,最终在地方层面演变为不可逆转的改废浪潮。

(二) 河南书院的被动响应与仓促改制

在“预备立宪”及将兴办新式学堂作为地方官员考核重要指标的压力下,各地书院无论其原有基础、财力厚薄,皆被迅速卷入改制洪流。《确山县志》里明确记述“光绪三十年,预备立宪议起,于是诏各省罢科举、兴学堂,并即各州县设学之多寡考察地方官成绩之优劣,以定殿最焉”^{[7]366}。这一时期或改或废的书院数量无法精确统计,记入方志中的书院数量有限,一般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书院。

从河南方志的记载可见,许多地方书院在1904年前后数年内被仓促改建为学堂,有的改为高等小学堂,有的改为中学堂或师范学堂。河南夏邑的崇正书院始建于明代嘉靖时期,后荒废,在清代道光时期开始重建,后毁于兵火。1885年,在当时知县、乡绅的努力下重修“讲堂三间、后堂三间、东西号舍数十间。大门三间外,有照壁及东西辕门。讲堂后斋室,为生童肄

业之所。讲堂外号舍,为考试课艺之场。四面环以围墙,院西有演武厅、箭道,为阅武之地。规模宏敞,诚巨制也”^[8]。但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书院荒废,1904年在其故址新建学堂。西华的衍畴书院,在明代较为兴盛,后时废时兴,“清末新学制颁布,县立学堂成立,而书院之名目终”,“光绪三十二年春,改衍畴书院为学堂,建筑前院讲堂斋舍,开办中学一班、简易师范一班、高等小学一班”^[9]。项城的莲溪书院建于乾隆时期,后经三次修复、扩建,1904年被改为高等小学堂^{[10]789-790}。安阳的后渠书院是当地第一所县立书院,建于1896年,但几年后,先后被改为县立小学校、女师学校、安阳第二小学校^[11]。西平的文城书院在嘉庆时期还在不断修缮、扩建,“凡童子县试、生童月课均在此举行”^[12],1902年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郑县志》所记东里书院建于1754年,1884年完成修复扩建,1904年改为中学校^{[13]156}。《禹县志》所记颍滨书院曾在1902年聘请名士李时灿主讲,书院一度出现兴盛局面,但很快在变革浪潮下,被改为高等小学堂和师范学堂^{[14]677-683}。

由此可见,河南地方对中央政令的响应深刻体现了自上而下改制的被动与仓促。河南书院的近世改制不是一个基于地方文教内在逻辑的自然演进过程,而是一场在国家意志强力主导下,以行政手段迅速推进的制度性替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发展轨迹,正是晚清传统教育体系在危机中被动、仓促转型的缩影。

二、转型之思:改制后的反思 与传统书院价值的再发现

通常情况下,书院的创建、修缮情况在方志中多有记录。晚清书院改制为时代大势所趋,但方志中留下的相关文字并不多。其中关于书院改废的有限记述,可以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书院的功能提供宝贵资料。河南方志中对于书院改制的记述并未停留在制度变迁的表象,而是透露出时人对传统教育得失的批判性审视与对书院精神内核的追认,体现了转型时代知识阶层在破旧与立新之间的复杂心态。

(一)对传统书院教育积弊的反思

方志编纂者清醒认识到,传统书院的衰落绝不仅仅是外力所致,其内部积弊深重,新式学堂的兴起就是在有针对性地纠偏补弊。“学堂所以兴,为救庙学、书院、义学之敝也”;“学堂之设,原为兴起人心、化成风俗、起见复古,即以救时务实,而非观美”^{[14]701}。可见,时人已将书院改制视为革除旧弊、“救时务实”的必要途径。志书的编纂者也开始对书院改制的得失进行反思,认为晚清书院“自学官不尽厥职,其弊也旷;书院仅课文艺,其弊也疏。洎学堂代兴,矫枉而或过于正,其弊也”^{[15]315}。《柳湖书院记》中直言书院已从“教化出其中”堕落为“功名出其中”,乃是“逐其末而不思反其本”^{[16]1271}。《重修滑县志》中也反映出当时书院教育困于“浮词末技”,只求应试的“速效”,而不诚心精研学问、不重经世致用的弊病:“虑士子谬于浮词末技,弗肆志图书,无以裕有体、有用、经济才也。”“夫教育之道,弗培其根无以畅其枝;弗息其深无由达其臆。今天下内外多故,事变迭兴,苟持空疏无据之学以应之,是犹朽索驭奔马、撮土障横流也……实事求是以行其所学,是乃办事通材、适用利器也……夫近世所以少成材者,求速效而无诚心故也。”^[17]

在河南地方文教、学术上有声望和影响的开明士绅对书院弊病也有深刻思考。李棠阶(1798—1865),曾官至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告归回乡后,主讲武陟河朔书院长达13年。此间曾作《河朔书院谕诸生》揭示当时书院文学教育的弊病,希望生徒能够自警。他强调:“国家设科,以四书经艺策诗取士,原欲使讲求圣贤之实学,稽考经史通知时事,以实得诸己者。发而为文,国家因以其发而为文者征其所行,此即古人考言询事之意也。源远流分,弊端百出至不可究诘,实力守分为举业者已属杰出,更安望其留心正学、刻苦勤修以期至于古之圣贤耶?然此流弊使然,非设科之本意也。”^[18]

方志中也揭示出书院在经费与管理上的重重危机,如经费常被挪用、侵吞,设施荒废、讲席滥竽充数等,展现了当外部支持系统崩溃时,书院这种高度依赖官方和士绅支持的教育机构如何迅速衰败。《弦歌书院捐钱碑》记载:“书院旧

有民捐钱三千串有奇,交当生息,为肄业生童每月膏火之费。自咸丰二年,前任挪用,而今废已久矣。余每欲兴复,奈兵火连年,军饷支绌,有志未逮。”^[16]¹⁰⁴²卢氏知县韩炬在《新建经正书院碑》文中回忆书院鼎盛时期的景象及其对“士习民风”的教化作用,描述书院衰败后的凄凉景象,展现出书院面临的现实困境:

士习与民风相表里,民风之盛衰,士习之纯驳为之也……设书院筹膏资,令士子肄业其中,互相观摩,因而登巍科、擢显宦,为一乡一邑所矜。式经正民,兴于斯乎?在贤司牧,情深化理,未有不以此为急图者……(笔者注:龙山、莘原两书院)尔时文风丕振、科第连绵,懿欵休哉,何其盛也!乃未几而兵燹递遭,沧桑多变,黍离茂草,触目怆怀。两地之故址徒存,百年之宏规顿失……龙山、莘原无复过而问之者,且请山长之脩金,渺无从出;发诸生之膏火,仅有微资。统计满年,止得六课,士子虽勤诵读、喜切磋,而一暴十寒、奉行故事,于人究何所加损哉!^[19]

这段材料以治理者的视角揭示了传统书院制度在晚清所面临的系统性危机及其根源,从中可见书院与地方社会的依存关系、书院制度的内在脆弱性以及国力衰退对地方文教事业的影响。由此可知,在书院改学堂的过程中,一些士人也在不断反思传统书院教育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解决,或许正是新式教育的立足点与突破点。

(二)对书院文教内核的持守

在批判传统书院积弊的同时,方志中亦不乏对书院精神价值的深切追忆与肯认。比如,方志编纂者认为,书院教育侧重现实的人格修养与经世关怀,不仅承担着督学考核的作用,亦寄托着读书人的文化情结,体现出文教传统的遗韵和温度。方志编纂者强调,书院之弊在于“志趣之误,非学校之敝”^[20]²⁹⁹,其明体达用传统与“培贤教俗”功能仍具有深远意义:“方今学堂林立,多士蒸蒸日上,宁见文章、经济堪与前哲媲美争光。而当日之三年宾兴,固抡才大典也;四时乡饮,亦教俗美意也。书院义塾之遗,固无非严厉课程之地也。”^[20]²⁹⁹《葵邱书院

创建碑文》《河朔书院谕诸生》等文献,皆重申书院在“端士习、正民风”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考城知县郭藻所作的《葵邱书院创建碑文》称:“多士以孔孟之学为学,即以春秋之志为志。虽近代书院之设,所业者赋诗缀文,非复三代学校之旧,然孔义廉耻之维,四者不可一日废而不张也。苟于所业孜孜讲求其四维之大,则三代经纶天下之大经,由此著矣。此之谓尚志,而奚以功利为病哉?况夫圣贤设科,来者不拒。”^[21]“孔义廉耻之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带有浓烈的现实色彩,兼具人格修养与经世关怀的双重指向,这正是书院长期秉承不弃的价值导向。在时人看来,书院不仅是知识传授之所,更是“孔义廉耻之维”的教化场域,承载着人格养成、经世关怀与文化认同的使命。

在八股取士广受诟病,西学涌入不可避免的时局之下,传统文化如何安放,知识分子的心志如何抚慰,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眼中一个亟待解决且影响深远的问题。面对西学冲击与学制剧变,地方士绅尤为忧心传统文化根脉之断绝。同为地方书院执掌者的高钊中和黄舒昂在书信往来中,流露出对书院文教与文化危机的忧思。高钊中在《致黄曙轩山长书》中指出要警惕“弃尧舜汤文孔孟之道,而惟西学是师”^[10]¹¹⁶¹的倾向,强调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见之明,故言之切;忧之深,故任之重……见万姓赴水蹈火亟思拯救,不暇择人……言时务者视八比空谈为无用,而欲弃之。八比诚无用,惟弃八比则必高阁孔孟,读书种子一断而人心亡,天地之心不可见,祸将有甚于两晋、五胡者,此思深虑远之士所由抚膺长太息者也”^[10]¹¹⁶¹⁻¹¹⁶³。黄舒昂曾同时主持、主讲于河南洛学、明道两个书院,在中州书院执教17年,授学数千人,影响广泛,其书院讲学堪称程朱理学与书院结合教育模式的绝响。

对书院文教传统的忧虑在陈宝琛、章太炎、刘春霖等名士的唱和中亦有回响。《西平县志附编》中收录了陈宝琛等诸多当时名士围绕一位文士昔日在南湖书院学习时的课卷而作的组诗^④,其中流露出对书院时代“清真雅正”文风与“伊洛遗风”的追慕。由此可见,改制虽已推行,但士人的文化情感与认同仍深深植根于书院传

统之中。如何安放千年以来的学统、道统、文统以及读书人的文化情结,在时代转型之下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反思的实践指向与历史意义

传统书院文教遗产该如何继承,是近世转型期内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此导向对教育转型路径的深入思考。从清末到民初,有学者不断追问,坚持给传统书院一个更合理的阐释与评价。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蔡衡溪的《从历代教育变迁中看出教育演进之自然连贯性》是一篇极富代表性的讨论书院变革之作,被收入方志之中,反映了书院改废给时人带来的长久反思。传统书院教育有着不可否认的价值和优势,方志编纂者们不回避矛盾,对其进行相对客观、理性的审视,这种文化态度应充分肯定。

蔡衡溪高度评价传统书院制度:“考我国历代教育历史中之可得称为有系统之教育制度者,要以宋之书院制为最早……此制掌教有官、育士有田,既无年限规定,又无资格限制,故萧规曹随,人皆得而入之。”^{[16]1063-1064}他认为,从两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外国技术与政治上的长处激起了国人的模仿心理,“因之改革教育之大业,便于是时开端;新式教育之进行,亦于是时发轫。从此一改其旧有之教育制度,而变为新式学校之设立”^{[16]1063-1064}。新式学校“在学校等级及类别方面,可云应有尽有;而在教育实施方面,亦可谓无美不备”^{[16]1064},却因“其实实际全系由外洋移置得来,与中国社会背景根本不合”^{[16]1064}而显露弊端,师生关系商业化、教育脱离社会需求等问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书院制的合理内涵。他认为教育制度的演进实为一种连环性过程,理想的教育形态应在借鉴外来制度的同时,融会本土书院因材施教、重视人格陶冶等传统智慧。

在实践层面,河南亦出现了寻求新旧融合的尝试。李时灿等人创办的经正书院以及陈宝箴设立的致用精舍,均在课程中纳入西学与时务,同时坚持“尊崇经术、先道后艺”,希望探索一条“中体西用”的改良路径。面对西学东渐的大潮,无论宋明理学还是乾嘉经学,都已经成为时世的赘学,挽救不了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初具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李时灿、王锡彤、高幼霞

等人,深感当时教育的穷途末路、误人误国,决心另辟蹊径,寻找正确的治学、教育方法,成立汲县读书学社^⑤,学社的影响迅速扩大到豫北各县。1898年,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思想的影响,李时灿决心创办一所新型书院,1901年,经正书院在汲县正式成立,在当时被誉为“卫辉文明之权舆,河南学堂之嚆矢”^[22],为河南书院的改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并起到示范作用。陈宝箴曾于1881年在武陟县创设河南第一所新型书院——致用精舍,开始尝试从学习内容上对传统书院进行改良。该书院除“习经史外,诗文、地舆、水利、农田、兵法,凡关经世各书无不讲究,先后延邓保之、王少白两先生主讲,历七八年,耆儒高教,多士翕然向风”^{[15]320}。在这场书院变革中,河南创办的新式书院还有新乡县东湖书院、封丘县正义书院、商水县文富书院、开封新街口信陵书院、信阳豫南书院、安阳后渠书院等。这些努力表明,部分先行者已意识到,教育的近代化不应是彻底的断裂,而应包含对传统资源的选择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

三、融合与新生:书院的变体 与新式教育的兴起

书院改制并非简单的组织更替,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与制度调适过程。在“学堂”这一新名目下,传统书院的文教资源、精神遗产与近代学制进行了复杂的互渗与重构。河南方志的记载显示,这一转型既有对西方教育制度的模仿,更有对书院精神的隐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传统书院和新式教育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实践中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状态,共同推动着近代文教形态的生成。

(一)新式教育中的书院遗存与变体

晚清书院的变革是中国古代教育形态向近代过渡和演变的重要一环。新式学堂虽然在形式上取代了书院,但书院的精神内核与部分制度安排却以隐性的方式延续于近代教育体系之中。传统书院与新式教育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二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对等相通性。

一是教育理念与育人宗旨上一脉相承。清廷设想,循着以功名励人的思路,旧式教育可自

然转变为新式教育。《中牟县志》记载：

清廷增设督办全国学务衙门，嗣改为学部，奏定学制分三级。国都设大学堂，即高等教育。各省设高等学堂，如现在之高中；各府设中学堂，如现在之初中，为中等教育。县设小学堂，如现在之高小，嗣改为高等小学堂，并初等小学堂，为初等教育。在大学毕业者，与给某科举人出身；由大学毕业后，在研究院研究，著有成绩者，与给进士出身；高等及中学毕业生，与给优、拔、岁贡生等出身；在高等小学毕业生，与给廪、增、附生等出身。自光绪二十九年设立中牟县小学堂，为创办新教育之萌芽。当时学制未定，府中学为县小学之主管机关，县知事为小学堂总办，教谕、训导为会办。嗣改总办为监督，改会办为监学，延聘教员，讲授经史，尚无其他科学。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劝学所，为教育行政机关之始基，改县小学为官立高等小学堂。至三十二年，增授科学，设堂长管理学校行政，与教员分授课程，学校规模始具。嗣将义塾改为官立初等小学堂。三十四年，劝学所改组，设所长一人，劝学员一人，各乡镇初等小学渐次成立。是年，官立高等小学第一期学生举办毕业，奖给廪、增、附等出身。人民感于功名，向学之风渐开。^{[23]198}

尽管学堂课程纳入了西学，但其根本宗旨仍强调以经术为体、以德育为主，致力于“定其心性，正其本源”^{[13]1163}。清廷在改制上谕中明确要求“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6]，地方办学也普遍秉持“尊崇经术、先道后艺”的原则。《郑县志》中收录有1906年的《中小学堂注重读经札》，文中称改制后的中小学堂的教育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够“上知爱国，下足立身”，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读经^{[13]1163}。“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13]1163}文中对新式学堂“率以西学为重，蔑视经学”^{[13]1164}的情况表示忧虑。该志中收录《移修东里书院记》，该文提出，希望诸生肄业其中，能够“励志前修通经致用，处为纯儒，出为良吏，不徒工文

艺掇科名而已”^{[13]1366}。这里其实已将书院“明体达用”“培德性而端趋尚”^{[13]1164}的传统置于新的教育框架之内。

对于当局的书院废止与改制政策，颍滨书院李时灿等人认为，可以此为契机来“变易近日文学虚浮之弊”，“期所在多得器使之才，渐升于大学，以供国家之用”^{[14]689-690}，倡导传统书院更加自然、从容地向新式教育过渡。武陟河朔书院改制为中学堂后，“立规约十余条，俾诸生于课艺外研究经史、性理、经济各书……务期学有实用，人尽真儒”的精神仍被延续。在新乡古鄗书院改设的精益学社，学生于课余“兼研究经史子集等书”，这正是书院重学术、重修养传统的遗存。一些文献认为，新式学堂与传统书院“名异实同”，部分新式学校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传统书院的变体。如《长葛县志》所记的陞山书院，1903年“蒙上宪催办高等小学，因思学堂、书院名异实同，即就陞山书院而整顿之……此时，虽名曰书院经费，而学校已萌芽于此矣”^[24]。

二是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呈现出新旧杂糅的过渡性。许多学堂在改制初期，“尚无其他科学”，主要讲授经史，实则书院教学的延续。随后，在“中体西用”方针下，课程逐渐扩充，但传统经史之学仍占据重要地位。时人认为，传统书院虽然偏重于儒家义理和文学辞章教育，但其规约制度已较为完备，新式学校可以借鉴兼容，使中西教育更好地融合，各展所长。《新乡县续志》在开篇小序中指出：“唐宋以来典制加隆，学宫而外又崇书院之制，儒林文苑之储益蒸蒸然盛矣。惟科目抡才，未免偏重文艺，历元明及清相沿不改，其间虽迭有盛衰，而以古先圣贤示之表率，孝悌忠义树之模范，苟掌教者得人，亦往往硕学名臣先后辉映，岂规制之未善哉？今学校亦重矣，参合中西德智体育，诚不背德行道艺之程，惟期规制早颁，急谋普及，既无末世偏重之嫌，适符古者明伦之旨。”^{[25]95}

颍滨书院李时灿等人对于传统文教的困境与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专门订立“师范蒙养学堂功课条例”，在传统的修身、伦常、义理、词章之学外，加入世界史、政治、地理、数学等新内容^{[14]683-688}，体现了“中西兼综”的尝试。这种课程设置可视为书院“经世致用”传统在西学刺

激下的扩展与更新。

致用精舍也曾“参照曾文正公课程,订立学规,以明体达用为宗,诵习经史外诗文、地輿、水利、农田、兵法,凡关经世各书,无不讲究”^{[15]319-320}。但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嗣后改课时文、试帖,与他书院等矣”,“义学以教童子,与书院相辅而行。兴学以来多半改为两等学校,而不变者寥寥焉”^{[15]319-320}。从某种程度看,武陟当时的传统书院已经有了新式教育的部分内容,隐约朝着新式教育的方向发展。后来当地成立育英文社,“每月在明伦堂课试,一次由公款局发给奖资二十千文”,这是由于“兴学以来,科学繁赜,学子昕夕讲求犹虞不足,其无余力及于国文也久矣”,“同人心焉忧之,组织此社专课经史,亦保存国粹之要道也”^{[15]326-327}。这一记述表明,当地在发展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并不回避和舍弃传统,仍然尽力发挥古典文教的优势。

三是书院作为地方文教象征与文化情感载体的功能得以延续。书院虽改为学堂,但其田产、资金往往转化为新式学校的办学经费,其物理空间成为新式教育的场所。《汜水县志》记载,当地在清代拥有6所书院,其中龙山书院后来被改为县立高等小学校,其他书院皆遭废止,其田产成为后来新式学校的重要经费来源。志书的编纂者这样总结道:“书院制系明清以来课士之地,虽科第时代竞尚词章,然昔贤作育人才之意不可没也。自海禁大开、环球交通,知墨守古训不足以应世变,于是注重科学。而我邑龙山书院亦于光绪末叶改为高等学校,莘莘学子可不奋然兴起,思为国家光乎?”^[26]该志的记述带有较为强烈的变革精神,由此可见从传统书院到新式学校,既不能泥古不化,亦不能背弃“作育人才”的初衷,奋起报国方为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新乡县续志》对古鄘书院发展与变革的记录,显示了书院近世变革、转型的渐进过程与丰富细节,颇具典范性意义。古鄘书院建于雍正初年,后屡有修缮、受捐,1901年改为鄘南学堂,并增设蒙养学堂,次年,延请中学、西学教员“分科讲授”,成为“新乡筹办学堂发轫之始”。1904年再改为高等小学堂,1912年改为高等小学校,并陆续设立中等农业学校、精益学社。其中,精益学社课余兼研究经史子集等书,是书院改制

后新式学校回溯传统的一个写照;中等农业学校后改称甲种农业学校。1915年,另设精益图书馆,“将本校原有新旧书籍,各种仪器、图书、标本分类罗列”;同时,接受地方士绅的文献捐赠,其中既有《涵芬楼古今文钞》《曾文正公全书》《船山遗书》《王阳明文集》等传统典籍,又有“劝学所、国民学校用书”等新式教学教材类书籍^{[25]132-142}。精益图书馆接收、汇聚古今书籍的举措,象征着近代文教机构对文教转型,以及新旧文化交融、整合做出的努力。

(二)新式学校的普及化整合与现实张力

同治年间的《重修明道书院记》曾对书院功能做了非常精辟的概括:“书院之设,所以阐教化、育人才而培士气也。”^{[16]1027}从书院的“培士气”到近代学堂的“增民气”,可以说新式学校正是在传统书院的基础上,继续朝着普及化教育的方向整合发展。这一过程以国家政令为主导,旨在建立统一、分层、面向更广泛人群的近代学校体系,但也在实践中遭遇了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清廷通过“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确立了从大学堂到小学堂的三级学制,并将办学成效纳入地方官员考核,从而以行政力量强力推动整合。河南地方积极响应,在短时间内以学堂的形式整合了大量书院、社学、义学乃至各级官学,试图实现学堂林立、教育普及的目标。《孟县志》在比较书院与当时的新式教育的基础上揭示出书院等传统教育形式的缺陷:“特昔时之书院,注重在少数人才,较现在之学校注重在普通国民者,为有异耳。孟县自古号称望邑,教育岂后于人?乃自清季兴学以来,几三十年乡镇有未普及,而私塾有未改良,犹憾事也。兹于儒学、书院、学校之设废,与夫历年规制之变迁,详著于编……俾后之职教育者知所趋重焉。”^[27]在众多方志中,这是少见的表现出主动变革精神的地方教育宣言。从少数人才到普通国民,编纂者从当地的教育现实出发,结合自身问题予以展望,视野开阔、立场开明,难能可贵。正如《郑县志》所云,新式学校的教学理念应“以经术为体、以德育为主”^{[13]1183},宗旨为“总期人尽知学,化乡愚之椎鲁,作有用之人才”,并且“力为讲求,亟图成效”^{[13]1183-1184}。

然而,新式教育难以真正普及。能入学堂的学生在当时非常有限,新式学校标榜的普及化教育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中牟县志》记述了新式学校取得的教育效果,颇具代表性:

嗣城西余庄及城南白衣堂、城东北东漳镇高等小学相继成立,因感于师资之缺乏,特设师范传习所一处,招收廩、增、附生入所肄业。同时,每地方各设初等小学堂一处,全县共五十余处,于师范生毕业后派充各该初等小学充当教员,以树国民教育之基础。县内创设工业学堂一处,教授织染两科,为生产教育之先河。豫南光、固、息、商等县士子来牟求学者络绎不绝,中年教育颇极一时之盛。宣统元年,学堂奖励取消,风气为之一阻,四乡初小相继停顿……民国成立后,劝学所依据功令,改官立高等小学堂为县立高级小学校,增设初级小学八处……统计各项教育,量的方面业已普及,质的方面尚待整理。若能依照计划推行无阻,则教育普及可期而待。^{[23]197-202}

此记载较为平实,对成绩和缺陷的揭示相对客观。从中可见,受教育者的积极性随着社会发展缓慢提高,教育的广泛性与深入性稳步向好。该志《名宦》中还记述了一位名为陈超的士人,他曾任中牟知县,热心教育,“在旧书院内创设习艺所,招收生徒三十名,学习织布、编席、木工等艺”^{[23]251-252}。

《确山县志》在指出新式教育对当地的基础教育和普及教育影响显著的同时,明确指出新式学堂存在“有形式而无精神”的问题和缺陷:

教育者,上之人所恃,以纳民轨物,范围不越;下之人所由,涵濡优游,日新月异,相率而适于政治之路也。教育良则人材出,而国家蒙其福;教育坏则人材隳,而国家受其祸。中国人材缺乏,亦知注重教育,冀图富强。然教育无普及之精神,则亦无完全之效果。各县小学固教育普及之基础,而天下人材命脉之所系矣……所虑者,奉行故事,有形式而无精神。^{[7]361}

这里对教育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指向,一方面反映出教育是使“上下相安”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新式学校的教育力

尚待发展完善。

实际上,在新式学校的普及化教育整合过程中,仍然需要传统书院继续发挥余热。在教育广泛参与性与研学的深入性方面,传统书院仍具有昭示性意义。清代中后期的书院,依然是很多士人走出仕途后的一个栖身息心之所。士人们从书院受教出仕,无论是否获得功名,不少人还是会选择回归书院,或主持书院,或担任主讲,或提供资助,以不同形式回馈新一代的生徒。而这种行为不局限于个人,有时也是一种家族行为。传统科举也在书院完成最终使命,形成社会教化功能的良性循环。即使在书院时代后期,书院文教依然是一项社会各方士人广泛参与的事业。这种精神值得新式学校在普及化教育的整合过程中继承和吸收。

由上可知,近世河南教育的转型既不是传统书院的线性延伸,亦非西方学制的简单复制。新式学校与书院的文教精神在冲突与调适中彼此塑造,共同构成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结 语

综上所述,近世河南书院的变革历程深刻记录了一方文教生态的时代变迁。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原地区文教传统的承续性与完整性,另一方面也展现了这一传统在变革、图存与自强的时代大势下所经历的挣扎、自救与新变。河南近世书院的发展变迁表明,书院的改制既是新式学堂在组织上进行制度化替代与普及化整合的过程,也伴随着书院明体达用之精神、经世关怀与文化认同以隐性的方式渗入新学制,实现文教内核的赓续与重构。

这种变体与新生揭示了“近世之变”的持续性影响与复杂面相,勾勒出中国教育近世转型的一条独特路径:它既是对时代危机的紧迫回应,亦内含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调适与创造性转化。《续武陟县志》中“海棠几树浓于染,犹识前贤手自栽”^{[15]529}的诗句,可谓这一历程的生动隐喻。传统的书院虽改制为新式学堂,但文脉如古树新花,隐然而续。新式学堂的普及化整合与书院精神的隐性延续,共同构成近世文教转型的一体两面,为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社会

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注释

①晚唐五代时期,河南拥有两所著名的书院——洛阳龙门书院和登封太乙书院。从现有资料看,这是河南地方最早的两座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也是中国较早的书院。②王洪瑞《河南书院地理初探》(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一文统计为292所,笔者根据清代河南行政区划,剔除掉隶属外省的大名府8所书院、曹州府2所书院,则清代河南书院共282所。③崑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第10325页。④具体诗歌见《中国方志丛书·西平县志附编》,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342—346页。⑤具体情况参见胡绍芬、耿玉儒:《一代耆儒李敏修先生》,《河南文史资料》1987年第5期。

参考文献

- [1]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050.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445.
[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3793.
[4]李宗棠.奏议集览初编:卷5[M].合肥:黄山书社,2016:175.
[5]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2.
[6]清德宗实录: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19.
[7]确山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8]夏邑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371-372.
[9]西华县续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404-408.
[10]项城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 [11]续安阳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1337.
[12]西平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396.
[13]郑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4]禹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15]续武陟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6]淮阳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17]重修滑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808.
[18]杨忠,贾贵荣.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27.
[19]卢氏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949-954.
[20]洛宁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21]考城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505.
[22]王日新,蒋笃运.河南教育通史:中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286.
[23]中牟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24]长葛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124-126.
[25]新乡县续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26]汜水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246.
[27]孟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539.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ademy Culture and Education Tradition in Early Modern Henan Local Chronicles

Jian Dong

Abstract: The reform of classical academies in Henan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constituted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response to modern crises.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over forty Henan local chronicle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modern Henan academies underwent a transition from compelled reforms to proactive adaptations.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reflected not merely in the organizational replacement of traditional academy systems by modern schools, but also in the mutual infilt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scholarly spirit, and new educational systems. This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was not a simple transplantation of foreign models, but a unique path shaped by the interplay of state will, local practice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widespread integration of modern schools and the implicit continuity of the academy spirit together represent the dual aspects of moder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modern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Henan local chronicles; classical academy; school; culture and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漱玉]